

流亡中的日常意义沉思

——源自抗战时期丰子恺的经历

朱小田

内容提要 在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活中,丰子恺的日常意义思考,涵蕴了诸多异于承平时代的元素。战争凸显了“活着”的价值;面对无可闪避的肉体灭失,丰子恺发展起个体生命的社会延续思想,并将“活着”的原始价值置于人类文明的坐标中进行充分估量和合理定位。战争将个体生存的方式汇聚于身外之物;在丰子恺眼里,日常生存之道不过是“本身之物”与身外之物的比较、身外之物的取舍与满足,而这一切与个体生存成本基本没有关系;战时外交关系触发了丰子恺的思维灵感:在不同的时空域中,私密的人际交往与社会交往具有不同质的意义。战争唤醒了共同体归依意识;背离世代植根的乡井,丰子恺获得了对共同体要素和时空特征的清晰意识,并将之在“家”的怀想中集中表达出来。

关键词 日常意义 丰子恺 抗战 流亡

自在的日常意义需要非日常的自觉方能获得。置身于日常时光中,丰子恺抱持着理性的问题意识,以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对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时时进行意义追问。不过,“故国闲居,生活平凡悠逸”,打开日记本,“既无可记,亦懒于握笔。勉强为之,则虎头蛇尾”。^①似乎不记也罢,缺乏意义追问的使命感。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寇的炮声从华北渐逼江南,1937年11月6日石门湾小镇^②被轰炸,丰子恺仓促辞别故园,率亲族十余人,辗转千里,流离不居。^③流亡是战争年代日常生活的特殊表现形式。尽管丰子恺极力避开兵燹,但它如影随形,牵引思绪;到达桂林乡间之两江洋塘岭,丰子恺虽得喘息于西南山水之间,但“蛮夷猾夏不已,神州丧乱日甚……心岂能如故国平居时之悠逸哉?”从此感念“兴而不息”。^④石门湾被炸的当天下午,从十里外的悦来村放来一只航船——平日里极平常地来往于镇乡的载货和代步工具,这时在丰子恺的眼里,“犹如救世宝筏,能超渡我们登彼岸去”。^⑤1939年4月8日在广西,丰子恺于一路旁草地坐憩;遥望屋宇稠密的宜山山城,静卧山脚之

①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浙江文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② 时属浙江崇德县。

③ 据丰一吟、丰陈宝《丰子恺年表》(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述丰子恺之流亡路线:初,急避附近乡间,负喧(浙江)桐庐,离开浙江,经江西萍乡、湖南长沙、湖北汉口、广西桂林、贵州遵义,抵四川重庆,至1946年秋返回江南,居杭州;其间暂居超过两月的地方有:萍乡乡下暇鸭塘,桂林乡间之两江洋塘岭,广西宜山龙岗园,遵义狮子桥晚南坛巷,重庆沙坪坝。

④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5页。

⑤ 丰子恺:《桐庐负喧》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浙江文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下,竟产生这样的联想:“仿佛赤子仰卧地上,静待虎狼之来食者。人间何世,有此景象?”^①就连饮食起居,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盛筵当我前,良朋坐我侧,为念流离苦,停杯不能食”(同名漫画)。^②碰见村民喂猪,就联想到汉奸,于是有漫画题为:“暴敌养汉奸,如人养畜生,今日给你吃,他日要你命”(同名漫画)。^③战争时势及其流亡经历由此极大地影响到艺术家的思想;当日常生活的意义成为丰子恺思考的主题时,其间自然涵蕴了许多不同于承平时代的元素。

“活着”的原始驱动

丰子恺特别关注的“护生”主题^④,撇开其宗教意味,在凡俗的意义上就是生命的维护,它是战争年代首当其冲的本能行为。需要我们首先确定的是,“生命的维护”所指何为?在唯物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生命的维护”作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被称之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含两层意义:“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⑤“生产”在这里其实就是维护,包括:生活资料的占有与消费;生命的蕃衍。然而,在更原始、更纯粹的意义,生命的维护还应当内含“防范肉体的意外灭没或缺损”,或不妨正向表达为求生,即追求“活着”的本能。^⑥

平居时的“活着”意识,通常以人类学所谓的“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规律性地楔入均匀流驶的日常时间中,人为地造成生命的“间歇”而得到提醒。作为通过仪式,祝寿是很特别的一种:不妨多次地进行;逢十年龄的仪式更为隆重;因为直接跟进年龄,其明显地包含着对“人活着”的警醒。但祝寿的自然依据毕竟是人的生理节奏,它的警醒性在自然规律的呈现中不经意地被削弱了。

1937年,丰子恺40岁;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生日那天,祝寿按老规矩照常进行:“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学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素筵。屋里充满了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一切似乎都是往昔程序的重复与循环,但按另外一种纪年,此日为公元1937年11月17日,时

①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26页。

②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6卷,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按,本文涉及一个史料应用的基本问题:(丰子恺)漫画能否作为史料?参见拙作:《漫画: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史素材——以丰子恺漫画为对象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③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3卷,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④ 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集》,丰之画,弘之字,共50幅;1938年弘一法师50岁生日之际,丰子恺避居广西宜山,又与驻锡福建泉州的法师合作《护生画续集》。时值全国人民奋勇杀敌的年代,丰子恺的护生画遭到许多人的非难。说者大约认为:“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丰子恺期期不以为然,指出,“《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护生”就是“护心”——涵养“仁爱之心”(丰一吟编:《我和爸爸丰子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以此观之,从日本方面言,“这么惨无人道的狗彘豺狼一般的侵略者……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在我方面,“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护生而抗战”(丰子恺:《一饭之恩——避寇日记之一》,《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656页)。丰氏的这种护生思想成为其思考生命价值的出发点和基础。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⑥ 从“生命的维护”中析出“活着”的本能,笔者受到两位思想家的启发尤多:一是中国哲学家李泽厚,他所建构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之出发点便是“人活着”这一原始现象(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二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önnies 1855~1936)在《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3页)中指出,在人的意志中,存在着天生的对某些事物或某些活动的乐趣,他称之为“普通的、动物本能的本性”;这种意志可以“用三重属性来理解:A.作为一般求生的意志,即肯定促进生命和否定妨碍生命的活动或感觉;B.作为要求饮食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或感觉的意志;C.作为要求繁衍后代的意志”。因为“与这些需要或渴求相适应的机能是一切有机体所共有的”,当然也包含在人的需要中。在这里,滕尼斯将“求生”在与“饮食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和“繁衍”的对比中,专门提出来,应该对我们认识“活着”在生命维护中的重要意义有所启发。

在北平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四个多月、在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三个多月，数年来不断出现在日常交谈中的“东洋人”已经打到了江南，“松江已经失守，嘉兴已经炸得不成样子。”前来祝寿的宾朋中，有从上海逃回来的，“谈话异乎寻常”：

（在上海南站）忽听得飞机声，火车突然飞奔，顶上的人纷纷坠下，有的坠在轨道旁，手脚被轮子碾断，惊呼号啕之声淹没了火车的开动声……无数难民无家可归，聚立在民国路法租界的紧闭的铁栅门边……法租界里的同胞拿面包隔铁栅抛过去。无数饿人乱抢。有的面包落在地上的大小便中，他们管自挣得去吃！我们一个本家从嘉兴逃回来。他说有一次轰炸，他躲在东门的铁路桥下。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婴孩，躲在墙脚边喂奶。忽然车站附近落下一个炸弹。弹片飞来，恰好把那妇人的人头削去。在削去后的一瞬间中，这无头的妇人依旧抱着婴孩危坐着，并不倒下；婴孩也依旧吃奶。^①

按常规，生日只是简单的日常“间歇”：通过共同体内部的程序性安排给不宠无惊的生命流程着上标记，但个体的日常生活与整体的社会生活是同步的，此时，来自外部的非日常事件已经渗入日常生活；战火映照的生辰祝福，完全不同于曾经举行过无数次的其他家人和邻里的生日庆典，而且，作为负面事件，日寇侵华最足令人震撼的便是对百姓生命的威胁，唤醒起人们强烈的求生意识。丰子恺说：“炸弹杀人，我祝人寿。除了极少数的暴徒以外，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惨死而欢喜长寿，没有一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他坚信“仁能克暴。”^②仁与暴，即善待生命与践踏生命，本来同时存在于日常与非日常之中，但在这里，一者：仁—日常—长寿，一者：暴—非日常—惨死，系列对应，鲜明比照；祝寿仪式所隐含的“仁”义为之凸显。

当41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流亡中的丰子恺一忆三叹：

过去一年中，艰苦，焦灼，紧张，危险，已经备尝。在他方面，侥幸，脱险，新鲜，快意的滋味，也尝过不少。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来比方我这一年间的的生活，很是恰当。^③

丰子恺在战争阴霾中历经的这一年，胜过之前的四十年，求生意识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激发这种意识的，莫过于活生生的杀戮。1938年9月24日，有族人自嘉兴来，目击其状云：“嘉兴吃炸弹，死伤甚惨。一女打去屁股。一母打脱头，手中犹紧抱襁褓。”^④1939年夏，丰子恺在广西宜山龙岗园，“几乎天天逃警报”，并遭遇了一次真正的轰炸：

警报钟响了，门前逃过的人形色特别仓皇〔惶〕。钟声也似乎特别凄凉……奔到一处地方，果然岩石屹立，连忙找洞。这岩石形似一个V字横卧在地上……我把身体横卧在石凹之内，羊齿植物之下……一颗炸弹正好落在V字的中心，“砰”的一声，我们这一群男女老幼在一刹那间化为微尘——假如这样，我觉得千千万脆脆的倒也痛快……儿女们回来报告：车站旁、运动场上、江边、公园内投了无数炸弹，死了若干人，伤了若干人。有一个女子死在树下，头已炸

①②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30~131页。

③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31页。

④ 丰子恺：《致陶亢德》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362页。

烂,身体还是坐着不倒。^①

与自然凋亡不同,肉体的意外灭没或缺损因其突然,常常给人以生命脆弱和无常之感,而由于战争的疯狂杀戮,这种感觉既震人心魄,又特别异样。1938年10月30日,丰子恺在桂林省立医院听女儿说,有人“腿被疯狗所咬,毒发不可留”,被截。奇怪的是,护士领她去看所截之肢,“宛如轰炸后所见,但不觉可怕”。炸弹所断与疯狗所断,结果相同,感受却如此不一;丰子恺衍论道:“同是断腿,一因于仁,一因于不仁,给人印象当然不同。”^②循着丰子恺的思路可以明白,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仁”,即对生命的善待,常常遮盖和淡化了“人活着”这一简单的事实。

头颅顷刻离身,生命转瞬即逝,战争的血腥给丰子恺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典型素材。1938年12月1日在桂林师范,丰子恺给学生展示了这样一幅漫画:一母亲背负一婴儿逃向防空洞,婴儿头已被弹片切去,飞向天空,而母亲尚未知之,负着无头婴儿向防空洞狂奔。这是丰子恺耳闻目睹的场景,被形诸画面,意在以“敌机轰炸之惨状”烘托日常“活着”的价值,激发抗日的意志。^③不料,漫画一挂上壁,教室里哄堂大笑:世间竟有无头婴儿!笑声让丰子恺惊愕不已:

此画所写,根据广州事实,乃现在吾同胞间确有之惨状,触目惊心,莫甚于此。诸生不感动则已矣,哪里笑得出?更何来哄堂大笑?……那组人正在对着所画的无头婴儿哄堂大笑的时候,七十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实演这种惨剧,也许比我所画的更惨。四五里宽广的小城市中,挤着十八万住民。向这人烟稠密的城中投下无数炸弹和烧夷弹!^④

冷静下来,丰子恺推想:“诸生之心肠必非木石,所以能哄堂大笑者,大约战祸犹未切身,不到眼前不能想象。”^⑤在日常生活中,“活着”的价值之所以被漠视,正在于此:自在的日常生活不会自我觉醒,日常生活的艺术表现也只是外在的唤起,非切身经历者难得真正的感受。但“活着”的价值倘然都要以现实的生命灭没来演示,代价未免太大了,于是,丰子恺愤然批评这些后方“眼光短浅、非亲见前线惨状不能感动的人”;他以为,日寇“将他们的暴行演给后方到处的人看……他们在我国内所投炸弹,每一颗是唤起民众抗敌的一架警钟”^⑥,这警钟也应当唤醒麻木不仁的常人,省思求生的价值。

无法讳言的是,在不同的时段里,日常意识中“活着”的价值其实是不同的。战争年代里,肉体灭没太过频繁和轻易,以至于灭没常常被纳入人们的意料之中而非意料之外。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中选取怎样的求生路径?作为佛教居士的丰子恺颇为矛盾。1939年1月30日,在桂林驷马山见“杭州流亡而来小难民”新坟,丰子恺“为流亡缘,不禁生吊慰之心”,默祝曰:

禽兽逼人,黄帝子孙无不震怒而奋勉者。墓中小女娃若夭殇,将来亦将效木兰之精神,捍

① 丰子恺:《宜山遇炸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浙江文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12~715页。

②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7页。

③ 丰子恺选择“无头婴儿”作为艺术典型,日常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Freud)指出:“说话或写作中一个人思想表达的微妙决定因素,是值得注意的。”弗氏举了一个与这里的“无头婴儿”非常相似的例子来说明: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我听到有人重复一段话:“如果某物突然射穿一个人的头。”我恰好知道他最近得到消息说一个俄国人的子弹正好从他儿子头上戴的帽子中穿过。见[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0年版,第222页。

④⑤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45页。

⑥ 丰子恺:《警钟》,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699页。

卫祖国……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小娃娃且安心于青冢之下，不久当有凯歌迎尔归葬于西湖之帝国也。

内心洋溢着入世的豪情。但紧接着与朋友信口谈及现代科学之发展与战争之惨烈，丰子恺即仰天而叹：

造物者作此世界，不知究竟用意何在？是直恶作剧耳。吾每念及此，乃轻视世间一切政治之纷争，主义之扰攘，而倾心于宗教。唯宗教中有人生最后之归宿，与世间无上之真理。^①

言语之间，又流露出明显的宗教情怀。丰子恺的内心挣扎所反映的其实也是时人普遍的迷茫。丰子恺之伟大在于：肉体的灭失既然无法回避，便积极面对；他将这种灭失置于宏大的宇宙和社会时空中进行思考，由此而发展起个体生命的社会延续思想；延续方式有二：其一，通过血缘的纽带，生命在下一代得到延续。漫画《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非常写实：抱着婴孩的年轻母亲，闲谈中正打听丈夫的消息，盼望战争结束，“良人”归田；这样，妻子有丈夫，孩子有父亲，生活回归至没有战争的日常。^②这应该是一幅历史群像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另一幅历史群像：《征夫语征妇，死生不可知，欲慰泉下魂，但视裸中儿》^③“死生不可知”应当是战争年代更普遍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焦虑心态；聊可慰藉“征妇”的是，哪怕“征夫”为国捐躯，他的生命之火仍然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传递。

其二，通过民族的纽带，生命在另一个体身上得到延续。在具体物质的意义上，作为特定个体，其肉体的灭没就是生命永远的失去，但在抽象精神的意义上，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丰子恺认为，民族却可以再造生命。在流亡途中，丰子恺妻子怀孕，他给还未出世的孩子取名“新枚”；他没有沉浸在香火绵续、家族添丁的天伦之乐中，而产生了“希奇”（稀奇）之念：

一定是在这回的抗战中，黄帝子孙壮烈牺牲者太多；但天意不亡中国，故教老妻也来怀孕，为复兴新中国增添国民……（“新枚”）这两字根据我春间在汉口庆祝台儿庄胜利时所作的一首绝诗。”诗曰：“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这孩子是抗战中所生，犹似大树被斩伐后所抽的新条。^④

这不是一般日常生活中自然意识，也不是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能够产生的意识，而是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整个宇宙时空中的思想自觉。^⑤这一自觉是如此强烈，促使他在整个抗战时期，一再表现“大树再生”的主题。^⑥用被斩伐了枝叶的再生之树譬喻生命，只有在国家一民族的意

①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82页。

②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6卷，第307页。

③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3卷，第382页。

④ 丰子恺：《未来的国民——新枚》，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667页。

⑤ 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命）者”何？1938年7月在桂林，丰子恺承认，“这东西……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救救国’。”见丰子恺：《佛无灵》《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708页。

⑥ 在1939年3月1日出版的《宇宙风·中国就像颗大树》（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39页）中附漫画；该画略作修改，收入1940年2月《大树画册》（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6卷，第37页）；在1941年10月《子恺近作漫画集》（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3卷，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中，有题为“更生”的漫画；在1946年10月《毛笔画册》（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1卷，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中，亦有题为“更生”的漫画，但画面有很大的不同。

义上是成立的。对此丰子恺十分清楚：人不行，而国可以；譬如，在前线，许多士兵被日本鬼子打死，后方能新生出更多的兵士，上前线继续抵抗；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新生出来的比原来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树。^①

灭没的个体生命在社会意义上延续，由此，人“永远活着”。这不是宗教彼岸的，而是人类此岸的；这不是太平日常的，而是战争日常的；这时产生的求生渴望是如此之迫切，以至于丰子恺对新生婴孩特别重视其生物机能：

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原故！^②

日常意识中对于新生命的种种社会性希冀在这里付之阙如，甚至成为讽谕的对象，几乎只留下求生本能。这样的本能，很容易产生于日常生活过程中：在桂林两江洋塘岭，丰子恺拟请工人修牛棚之漏，平牛棚之地，留给新枚居住。^③但这是战时的日常，流亡中的日常，在这样的日常中进行非日常的省视，“活着”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重视。

个体生命的社会延续原本是人类延续的自然方式，藏匿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一旦它被炽热的战火烘托，必然引发人们对人类文明的认真审视，由此，“活着”的价值在人类文明的坐标中得到更准确的衡量和定位。在人类文明结构中，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非均衡发展最终所导致的严重恶果之一便是漠视“人活着”，睥睨“末日的审判”。纵观人类文明史，文明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最关键地表现为精神文明要素的滞后与残缺：一方面，确立起民族—国家等制度文明的至高无上性，便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同名漫画）^④的无奈，便有了“马革裹尸真壮士，阳关莫作断肠声”（同名漫画）^⑤的豪迈，便有了“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同名漫画）^⑥的讽谕；事实上，这也是制度文明的历史合理性，丰子恺对此加以充分肯定——比如战争之际，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在场，在民族—国家的集体旗帜下，一部分人的生命灭没成为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奉行物质文明的自然优先性，便有了对人类生命的无情戕害，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物质文明的天然双刃。对此，流亡中的丰子恺，感触良多。1939年4月7日，他来到广西“屏绝之于化外”的瑶民区，发现市中竟有“专售于瑶民”的火刀、火石及石绒等日常用品。在已经出现打火机的时代，“重见此物，殊觉新鲜”，因为“髫年时曾见故乡老农用此物”，于是，他买了一具，“取而用之，费力甚多，而火不易得。”他承认“物质文明，诚可宝贵”。^⑦但是，“用科学治日常生活，岂非最幸福的人类生活么？”处于流亡情境中的丰子恺立即意识到物质文明进步的负面性：“古代的人从事侵略，用刀枪矢石来杀人。现代科学发达之后，侵略者都用炮火飞机和毒气，比以前便当得多，有效得多。”^⑧结论是：“物质文明片面发达，实人世之大祸也。”^⑨所谓片面发达，指物质文明决不可脱离了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单独发达：“倘教物质文明单独发达，则正义，公理，人道都要沦亡，而人类的末日到了。”^⑩而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基本追求，正义、公理、人道不是别的，首先是美国人本主义思想家

① 丰子恺：《中国就像颗大树》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38页。

②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5页。

③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5页。

④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6卷，第235页。

⑤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6卷，第53页。

⑥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6卷，第181页。

⑦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25页。

⑧ 丰子恺：《物质文明》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701页。

⑨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25页。

⑩ 丰子恺：《物质文明》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701页。

马斯洛 (Maslow) 最重视的“生理的需要”, 其次是“安全的需要”, 这还是马斯洛的精辟揭示。舍此侈谈文明的进步就离开了基本的前提。这就是“活着”的原始价值所在。

综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思想家鲁道夫·奥伊肯 (Rudolf Eucken, 1846~1926) 指出, 在对生活世界进行的思考中, 不管是以“宗教和内在论唯心主义为代表的旧有秩序”, 还是包括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在内的现代“实在生活图式”, “凡涉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它们便截然对立”。^① 然而, 丰子恺张扬日常求生的价值, 却克服了将人类生活动物化、本能化的自然主义, 凸显人类思想结构中精神的力量和导向; 他十分重视精神要素在文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却克服了片面追求抽象理想的理智主义, 并设法躲避宗教光环的笼罩, 从历史主义的角度, 充分肯定以民族—国家为至上利益的制度文明, 并从这种历史合理性中部分解决了“活着与灭没”的内在矛盾。这样, 面对缤纷繁杂的现代思潮, 丰子恺在历史和结构的纵横坐标中, 对求生本能进行了相对合理的估量和定位, 就此而言, 流亡中的丰子恺对“活着”价值的思考更见真切。

个体生存的方式

在个体与社会的意义对待中, 日常生活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 因为, “没有个体的再生产, 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 而没有自我再生产, 任何个体都无法存在”。^② 从个体自身的角度, 个体再生产就是个体生存, 就是日常生活。个体生存以其直观而弥散的样态, 存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之中, 很少吸引普通人的思考; 而经典思想家的理性目光则常常将之作为“社会的基础”而悬搁。丰子恺的特别之处在于, 他一直关注日常生活, 而在战争年代, 他对个体生存的思考, 与平居时代相比又颇为别样: 或者凸显潜在意义, 或者演绎新的意义。

个体生存的特定背景在丰子恺流亡一年后的反思中变得非常清晰。经过一年的跋涉, “站在崎岖的丘壑中”回顾流亡前的日常生活, 丰子恺觉得, 那“犹如一片大平原, 长路漫漫, 绝少变化, 最多不过转几个弯, 跳几道沟, 或是渡几乘桥梁而已”; 因为“太过平坦, 竟变成了平凡”。^③ 日寇的铁蹄踩碎了这种平凡, 改变了丰子恺惯常的思维模式; 战争及其战争给予日常生活的“非常经验”成为丰子恺思考个体生存意义的浓重背景。具体地说, 丰子恺的思考对象集中在两方面: 一者生活资料的占有与消费, 一者日常交往。

个体生存明显依托于身外之物。在日常生存之道中, 与“活着”相比, 作为生命维持的手段, 生活资料的占有与消费永远是第二位的: 前者是“本身”之物, 后者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常常是丰子恺表现流亡生活的道具: 依依杨柳, 呢喃春燕, 负重流亡, ——“身”与“物”构成了一幅极不和谐的《流离之春》; 大树下的流亡者气喘吁吁, 行李成了逃命的累赘, 这便是《流离》^④

1940年向遵义逃亡途中, 丰子恺一时滞留广西河池。清晨在车站, “手里拿了一大束钞票而找司机……有的问我有几个人, 我说人三个, 行李八件……他好象吓了一跳, 掉头就走, 如是者数次”; 其实, 丰子恺还有意将行李少说了: “其实是五个, 十二件。”^⑤ 这就是身外之物在流亡中的重要地位; 流亡者不仅有人, 还有物, 物是流亡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但“物”终归在身外, 战争的外力

① [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②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③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31~32页。

④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3卷,第290~292页。

⑤ 丰子恺:《艺术的逃难》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71页。

足以将之与“身”分离。1939年1月在桂林,丰子恺向所“敬爱”的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舒群^①赠画;来到南门内舒群的住处,但见:“其屋半毁,仅其室尚可蔽风雨,但玻璃窗亦已震破。其室四周皆断垣颓壁及瓦砾场,荒凉满目。”丰子恺说,“倘深夜来此,必疑为鬼物。”从生存的角度,舒群已经近似“鬼物”了:上月大轰炸时,九死一生,逃得此身,抢得被褥。后来每天早晨出门,他将被褥放后门外地洞中,夜归取用,以防敌机再来炸毁。炸弹剥夺了舒群的几乎全部身外之物,只留下一条被褥。丰子恺唏嘘不已:“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矣!”^②他不过应景而发!实际上,此为真正的“天道”：“本身”永远重于“身外”。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当然取“本身”而舍“身外”,此其一;

然而,由此可以断言,物质的取舍仅仅出自人之本能吗?又不完全是这样。丰子恺认为,身外之物的取舍“惟心”,此其二。1939年初,丰子恺居萍乡鸭塘萧祠,“房间里四壁空虚,行物萧条”;不久又有: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缘缘堂已全部焚毁。消息传到,家人亲戚聚讼起来:

有的可惜橱里的许多衣服,有的可惜堂上新置的桌凳。一个女孩子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一个男孩子说:秋千架和新买的金鸡牌脚踏车最肉痛。我妻独挂念她房中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瓷器。

但丰子恺超越了一般日常所想:

我离家后一日在途中闻知石门湾失守,早把缘缘堂置之度外,随后陆续听到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象它已变成一片焦土,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况且,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③

由此不难发现,在本身之物与身外之物的比较和取舍中,人之本能只是其中一方面,当“活着”存在危险时尤其如此,但另一方面,一旦获得生命在场,紧接着就是个体生存,就是日常生活,就是在身外之物之内进行取舍,取舍的态度主要不是本能的意识,而是意识的能动。流亡之初在杭州拱宸桥,有两个“再也带不动的”包裹被丰子恺擅自放弃在船里。包裹里是两条最上乘的丝绵和几件较新的衣服。流亡中每逢冬季,家人一直埋怨丰子恺的孟浪:“早知如此,拱宸桥上岸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背了它走!”最初,丰子恺窃怪:“缘缘堂中无数的衣服器具书籍尽付一炬,何以反不及拱宸桥抛弃的一些东西的受人怜惜?”从这“一件小事”里边,丰子恺认为“大有道理”:

缘缘堂所损失的虽多,其代价是神圣抗战以求最后胜利,是大家所甘心的。拱宸桥所损失的虽少,但由于慌张与无计划,因此足以引起长期的后悔……义之所在,视死可以如归,何况区区身外之物?情所不甘,一毛不肯拔,何况拱宸桥船里崭新的丝绵与衣服呢?^④

这样的心态,是丰子恺在流亡途中逐渐形成的:“沿路看见万众流离的苦况,听见前线浴血的惨闻,对自己的房屋的损失,非但毫不可惜,反而觉得安心。”^⑤

①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58页。

②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80~81页。

③ 丰子恺:《还我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53~54页。按:箱垫,即搁箱子的柜子。

④ 丰子恺:《桐庐负暄》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1~12页。

⑤ 丰子恺:《焦土抗战的烈士》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698页。

其三,身外之物的满足往往在简陋生活中得到更强烈的体验。流亡的生活是简陋的,这是战争的造就。养尊处优的丰家人,不得不与无数流亡者一样,“扒车顶,宿凉亭,吃大饼,喝冷水”。^① 意想不到的,餐风宿露、饥寒交迫的流亡给他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感受。在杭州逃往桐庐途中,大家饥肠辘辘,丰子恺拿出一些油沸粽子分送给“十余个饿人,就当作夜饭了”。这是在杭州六和塔下的一家茶店门口买的,先前已经吃过,但在这时,丰子恺感觉异样:“这一只油沸粽子非常味美,为我以前所未曾尝到。我一粒一粒地吃,惟恐其速完。”就在欣赏米粒的过程中,丰子恺发现:

这美味,分明不在粽子上,而在我的舌上。可知味的美恶无绝对价值,全视舌的感觉而定。大饥大荒,则树皮草根美于梁肉;穷奢极欲,则梁肉味同糟粕,而必另求山珍海味。得十求百,得百求千,得千求万……

这奇怪的美味,次日在浙江富阳的面食里又一次产生了。清晨,大家肚子饿得很,便上岸去找食物。丰子恺带了两个孩子,到一家小吃店吃素面:“约有两天不得吃热食了,这碗面热辣辣的,味美无比。”^②

流亡的日子里,丰子恺经常可以“享用”这种“过去没有的”美味。在1939年7月28日的《黔桂日记·宜山》中,他写道:

时已正午……吾等皆尚未进食。饥甚,向附近村中求食。无店铺,食物了不可得。忽见一老姬携竹筐行村旁,筐上盖白布,似是卖小食者。亟追及之,启其布,香气扑鼻,皆黄豆粉悖糯米团子,大喜……^③

丰子恺的满足感固然不在粽子、素面和糯米团子里,其实也不全在舌头上,更重要的是在心里。这是在简陋生活里才能体会得到的。令人不解的是,在太平岁月所谓的“啰嗦生活”中,却没有这样的满足感。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简陋生活与“啰嗦生活”实际上生存成本的大小不同。而身外之物的满足与生存成本的大小基本没有关系。

个体生存的成本是平居时代的丰子恺曾经思考过的问题。1935年4月的一天,丰子恺偶然来到莫干山“三家村”中的一户农家,“站在门口已可一目了然看见她的家里……一灶,一床,一桌,和几条长凳,还有些日用上少不得的零零碎碎的物件……衣裳穿在身上了,这里所有的都是吃和住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设备,除此以外并无一件看看的或玩玩的东西”。想起在杭州“打算暂住的”租房,有电灯、书籍、文具、书画……丰子恺感到“太啰嗦了”。这是阶级的差别:“农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码设备以外,极少有赘余的东西”;而丰子恺依旧“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人中度着啰嗦生活”。^④ 最“啰嗦”的是家中炉香,“不惜费用。每月为香所费,比吃饭贵得多”。抗战军兴,丰子恺“弃家西窜,流离迁徙,深入不毛。有时连香烟都缺乏,谈不到炉烟。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谈不到点香……(烧香)这癖好一直戒除了九年”。^⑤ 流亡至桂林,丰子恺租到三间平房,家徒四壁;买竹器最合适,床、桌、椅、凳,皆竹制,仿佛回到了“竹器时代”。所有家具,“共费法币三十余元。在上海,

① 丰子恺:《“七七”三周年随感》,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41页。

② 丰子恺:《桐庐负暄》,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6~19页。

③ 丰子恺:《荒冢避警》,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719页。

④ 丰子恺:《半篇莫干山游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484页。

⑤ 丰子恺:《我的烧香癖》,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85页。

这一笔钱只能买一只沙发,而且不是顶上的”。^①没有了炉香,没有了沙发,日常生活依旧在过。由此可见,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或者说个体生存的成本,其幅度非常之大,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生命维持本身,而是外在的社会因素。

以交通为例,1938年秋,丰子恺的暂居地距其所任教的桂林师范学校约五里,“若在平时,非坐黄包车”,但当时没有黄包车,况且当地“环境中的人都苦干,视步行五六里不但是应该,且是乐事……自己也不觉耐苦起来”。^②更有趣的是排泄,丰子恺竟在离学校二三百步公路旁“矮而密”的松树林中,找到了专用的“野外厕所”;“日记”称:每晨赴校,行至此处,必一造访。先将围巾帽子挂(树枝)衣钩上,然后如厕。粪落丰草丛棘中,但闻其声,不见其形,有似抽水马桶然。^③简陋一至于此,恐初民亦无法超越。唯习惯成自然;令丰子恺意想不到的是,“久不用抽水马桶,且常在野外大便”,一日在桂林乐群旅社“用抽水马桶两天,反觉不及野外之舒畅”。^④

那么,抽水马桶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需的呢?或者更一般地说,生存成本高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人类学家通过对现存“野蛮”族群简单生活方式的观察,将时间置换成空间,以此估量初民社会的最低生存成本,从而发现,文明族群虚高的生存成本主要源于变迁的时代、有闲的阶级、优越的环境和特定的文化。按照“田野工作”的要求,这一发现应当是“参与观察”的结果。丰子恺不是人类学家,他猛然撞见“三家村”的简单生活方式,以文化旁观者的身份在共时性社会结构中揭示了其中的阶级内涵。或许,丰子恺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永远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但在战争年代的特定环境里,丰子恺实际“参与”到简单生活结构之中,真实扮演着这一生活的角色,体悟个体生存成本的实质。

与具有明显实际价值的生存工具相比,日常交往的意义何在?这是在关于日常意义中非常容易忽略和轻视的问题。流亡前的丰子恺已经注意及此。在漫画《张家长,李家短》中,两位村姑一边洗衣,一边闲聊;在许多人眼里,闲聊就是无聊:这些近乎本能的日常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丰子恺借古诗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趣味就在于此:以“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这样的“事”其实并非无益:“遣有涯之生”就是它的益处,它延续了个体生命的存在。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来看,“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⑤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即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

这是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意义;至于闲聊本身的意义,仍不甚了了。1939年9月5日或6日《广西日报》有一篇论文,详叙德波英法之形势后定评:“此次欧战,大不利于倭寇,而能促成吾国最后胜利,无可疑议。”14日在广西思恩,丰子恺读到此文,略时人普遍关心的东西方战事不论,“忽提神太虚,俯瞰万象”,觉得此番宏论,“犹乡间绅董之论事耳”,——

此人熟悉全乡各家各户之底细,牢记过去种种事件之历史,而富有见识与胆量。乡中设有纠纷,则是非成败利害,早在彼洞察之中。故其论事,令人折服。一乡与全世界,大小不同耳,人情事理,无以异也。设视世界为一乡,则今报志所载各国军政情况,与“张家长,李家短”何以异哉?某某订立不侵犯条约,与“某某攀转折亲”何以异哉?“某某犯某”与“阿三打阿四”

① 丰子恺:《桂林初面》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65页。

②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5页。

③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96页。

④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8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何以异哉?^①

此论绝无鄙视作者论说之意,相反,丰子恺认为,“此君对国际形势具有精锐之眼力,此言令人欣慰。此人令人钦佩。”只是丰子恺独辟蹊径,以国际纷争譬喻日常交往,无意间揭示出日常生活的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丰子恺的论述时空,完全超出了人类社会范围,更在宇宙“太虚”中纵横:一方面将日常交往与战争纷争等量齐观,另一方面将日常交往与微观世界中的“螟蚁之斗”同日而语:

白居易有诗云:“惟螟杀敌蚊眉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里斗英雄。”此人乃在一微尘里论英雄。^②

出入宇宙时空的气魄和方法,让我们充分相信,这决非简单的日常类比;事实上,日常交往的意义揭示应当在一定时空域中进行;事物运动的意义是与一定的时空域相对应的。从这一角度说,共同体中日常交往的意义,既不比动物世界中的“螟蚁之斗”来得高深,也不比以地球为战场的人类战争来得低微;它们各有不同质的意义。

共同体的归依

流亡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丰子恺生活在石门湾^③,——江南水乡平原上的一个典型共同体。他的日常生活就在这一“个人的直接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关……所有与个人及其直接环境不相关联的对象化(活动),都超出了日常的阈限。这并不是说,日常生活对象化的有效半径,在个人及其直接环境处陡然中止”^④,相反,它以共同体环境为基础,通过各种交往超越共同体,并将之与其所抵及的整个世界联系起来。1914年,17岁的丰子恺来到杭州,1921年东渡日本,当年回国后,奔波于沪杭甬以及绍兴的上虞等地,至1937年底离开石门湾。除了短暂的日本旅居生活,丰子恺主要在江南核心区域背景中观照石门湾,与其说是观照,不如说是欣赏和享受,因为对丰子恺来说,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上的众多共同体似曾相识,不少就是石门湾的复制,无论从物化景观,还是在思想情感上,都不足以形成明显的反差,促使他特别地审视一直的生活共同体。

事实上,江南水乡人物千百年来就生活其中,归依于其间的地理和社会关系之中。这是江南共同体的一种类型——水乡共同体。^⑤从日常生活角度看,共同体的归依意味着人的个体的普遍生活状态;在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逻辑——“人活着”(出发点)——“如何活”(人类总体)——“为什么活”(人的个体)——“活得怎样”(归结)——中,“活得怎样”关注的是“个体的心”:你处在哪种心灵境界和精神状态里?这样的“心灵境界和精神状态”常常融汇于共同体,故而亦可诗意地称之为“故园情意”。^⑥“故园情意”是一种由距离产生的日常意识,所以当丰子恺归依其中时一般无由而生。日军的炮火摧毁了繁华都市,打开了重门深院,将丰子恺从“化内”江南驱赶到“化外”

①② 丰子恺:《病中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64页。

③ 今浙江桐乡县;时属崇德县。

④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⑤ 在完整的江南地域社会中,山村、水乡和高地等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社群)以地势的形式加以呈现。考虑到地域江南的生态类型,社群史的研究,自然应选取不同类型的社群作为样本,以体现地域社会的整体性。见拙作《人类学方法在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应用》,《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⑥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21~27页。

边远^①,眼界为之一开。在这广阔的视野中,丰子恺得以观察他者共同体和反观自身共同体,正如他后来回忆的:走过五省,经过大小一百多个码头才知道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②话虽不无自得,但日常共同体意识确实是在流亡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首先关于共同体的构成。共同体的环境是其存在的物化空间,作为构成要素,它外在地体现共同体的特色。石门湾是水乡,“运河两旁,支流繁多,港汊错综。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石门湾就是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③一直生活在江南的丰子恺来到广西永福县城,不觉失笑:“城甚小,不过我乡五河泾,或杭州茅家埠。”^④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四周是大平原,气候当然是海洋性的。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水陆的调剂特别均匀,所以寒燥的变化特别缓和”。丰子恺“流亡之后,经过许多地方”,自然又有一番比较:

有的气候变化太单纯,半年夏半年冬,脱了单衣穿棉衣。有的气候变化太剧烈,一日之内有冬夏,捧了火炉吃西瓜。这都不是和平中正之道,……这时候方始知道我的故乡的天时之胜。

在这样的天时之下,作为特产,“在石门湾成为普遍”的桑树和丝绵之价值,亦非他方可比:

乡村人家,无论贫富,春天都养蚕,称为“蚕宝宝”。他们的食仰给于田地,衣仰给于宝宝。所以丝绵在我乡是极普通的衣料。古人五十岁才得衣帛,我们的乡人无论老少都穿丝绵。他方人出重价买了我乡的输出品,请“翻丝绵”的专家特制了,视为狐裘一类的贵重品,我乡则人人会翻,乞丐身上也穿丝绵。^⑤

在与“古人”和“他方人”的对比中,即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中,共同体的特色通过地方特产体现出来。

坐落在江南水乡之中,丰子恺所在共同体的景观格局是,以石门湾小镇为中心,联结了方圆约10里内的数个村庄;在以航船为基本交通手段的时代,离镇稍远一点的乡下航船,总能在上午赶到镇上^⑥;近的村子,步行上街。航船所牵系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物产,更重要的是其间互动的人际关系。共同体意味着“共同的关系和参与”,正是这种“关系和参与”,共同体“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⑦因此,“共同的关系和参与”是共同体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安居乐业之时,这种关系通过由村落向市镇的集聚表现出来,而在战争年代,关系的流动则是反向的。1937年11月7日的早晨,石门湾依旧喧阗扰攘,傍晚便水流云散;日寇轰炸之后,家家闭户,处处锁门,顿成死市。三、四里外南沈浜村的蒋茂春,是丰子恺妹夫,听到炸弹声,立刻摇来一只

① “化外”旧指政令教化达不到的地方,“化内”与之相对应。1939年4月7日,在广西修江,丰子恺赴当地市集,“见瑶民甚多,皆戴尖顶帽,衣绣花衣,言语颇可听。面貌人情亦与常人无别。不知缘何规定此种人为瑶民,而屏绝之于化外……然‘化外’生活,或比‘化内’生活自由幸福,亦未可知”。见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24页。

②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19页。

③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0页。

④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57页。

⑤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1~122页。

⑥ 丰子恺:《四轩柱》,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737页。

⑦ [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65、52页。

船,邀丰子恺家人迁乡。登舟入乡的不只是丰家,“河中船行如织,都是迁乡去的……镇上的人尽行迁乡,疏散在附近各村中”。平日里,乡下的妹妹常与丈夫茂春回镇上娘家;战争临头,镇上的丰子恺流亡至乡下的妹妹家,“有许多平时不易叙首的朋友亲戚得以相聚”。丰子恺七十余岁的老姑母最初客居八字桥王蔚奎家,不久也来到南沈浜。丰子恺幼时业师沈蕙荪先生逃避在离南沈浜一里许的村中,派他的儿子来探询丰子恺的行止;丰子恺也亲去叩访、慰藉。丰子恺家的染坊店被炸弹解散,店员各自分飞,这时都来探望丰子恺。共同体中的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凡此种种,“皆有强大的力”系缠着丰子恺的心,使其“非万不得已不去其乡”。^①这样的关系及其维系力在一般情况下自然是难以体会到的。

共同体中的文化意识,即由传统、风俗和观念等浑然而成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比“共同的关系和参与”更难意识到的要素,但在“离乡五六千里,风俗多所乖异”的广西两江,流亡中的丰子恺欣喜地发现了它的存在:1938年11月23日下午,闲步到两江圩,买得一种圆子,大如栗子,粉细,糖馅;糖是柳糖,味甚鲜。如此高度的评价,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丰子恺“到广西后,常嫌食物不合胃口”,可“这圆子颇赶得上家乡滋味。统计起来,赶得上的不止这一种。还有大桔子,甘蔗,都是价廉物美的食物。大桔子形似吾乡之香椽……汁多而甜。大类广桔。六铜板吃一广桔,在吾乡不办”。^②褒贬事物的唯一参照就是“吾乡”,其间透露出无限的乡情。战争迫使丰子恺离开“吾乡”,客在异乡,却发现了“吾乡”。

其次关于共同体的时空特征。

共同体时间伴随着两种基本节奏,或者自然的更迭:昼夜交替,春耕、夏锄、秋收、冬眠,或者生老病死的生命律动。人们生活于其中,遵循着自然尺度;正常状态下的日常共同体呈现出循环往复、凝固恒常的时空特征^③;而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世界反法西斯战事进程时时敲击着日常生活,不断涌现的时来运转,让丰子恺感到,曾经的共同体的循环往复似乎恍如隔世、永远不再。1945年下半年,在重庆沙坪小屋的晚酌中,丰子恺眼看东京被轰炸,墨索里尼被杀,德国败亡,波茨坦宣言,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他觉得,“有生以来,从未吃过那样的美酒”;它与在此之前石门湾老屋中的父亲晚酌不同:大家吃过夜饭,父亲才从地板间的鸦片榻上起身,走到厅上来晚酌。桌上照例是一壶酒,一盖碗热豆腐干,一盆麻酱油,和一只老猫。^④——这是一幅几十年如一日的《乡间举人晚酌图》;在此之后,丰子恺回到江南,“照旧每天晚酌,然而味道远不及沙坪坝的渝酒”。^⑤沙坪的日常是战时的日常,特别在8月18日的那个狂欢之夜,“日常”似乎已经消失,“唐突”二字“已从中国词典里删去。”如若有人不唐突,倒是怪了;丰子恺发现了一个怪人:“照旧默默地坐在篱角里的小凳上吃他的烟……他的确不知道‘胜利’的!他对于街上的狂欢,眼前的热闹,大约看作四川各地新年闹龙灯一样,每年照例一次,不足为奇,他也向不参加。”^⑥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例行公事的日常,比如新年闹龙灯,在大多数人看来,不过循环往复的虚应故事,不足为奇。但日本投降那天的日常是千载一遇的日常,是明显唯一的日常,这是

①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35~137页。

②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36页。

③ 丰子恺说,日常闲居宛如音乐:如果把一天的生活当作一个乐曲,其经过就像乐章的移行。一天的早晨,晴雨如何?冷暖如何?人事的情形如何?犹之第一乐章的开始,先已奏出全面的根底的“主题”。一天的生活,例如事务的纷忙,意外的发生,祸福的临门,犹如曲中的长音阶变为短音阶,C调变为F调,柔板变为快板。其或昼永人闲,平安无事,那就像始终C调的行板的长大的乐章了。见丰子恺:《闲居》,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119页。

④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3页。

⑤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82~183页。

⑥ 丰子恺:《狂欢之夜》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03页。

非常的日常,惟其非常,凸显出日常的平常。

突如其来的战事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宁静,变幻无常的世事,让丰子恺对曾经置身的凝固恒常的共同体倍感珍惜。

江南的清明,例行扫墓,“借墓游春”,岁岁年年,一切照例。^① 1938年4月6日在广西修江的三江街,丰子恺宿小客栈,与人闲谈,被告知:次日有市集,瑶民贸易者甚多,可以一看。查过日历,他心中一惊:此日阴历二月十七日,正清明也。回忆承平之年,此日此时,正当插柳栽花,踏青扫墓。不意今日流离,至于忘却!^② 旅人怎能不为之断魂。

次年清明在宜山,遇上紧急警报。丰子恺“照故乡习惯,裹‘清明粽子’带着走。这时候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朗气晴”。丰子恺说:下午真是幸福!从两岁到七十岁的,全家动员,出门游春,还邀了几位朋友参加。真是何等的豪爽、风雅之举!本来这一切就是俗例,几乎不值得一提;可这时竟成了奢侈的想像:因为他始终忘不了这是在宜山“逃警报”。^③

在中国人最重视的除夕之夜,丰子恺的“无常”感变得无以复加。1938年的除夕,流亡才两月,丰子恺居萍乡彭家桥萧祠,“环境荒寂,行物萧条,零丁孤苦,莫甚于此时。”至次年除夕,则大不然:“打年糕,吃年夜饭,席上更添一初岁娇儿,笑语满座。融怡之乐,且过于缘缘堂中。”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又回到从前,回到恒常的“照例”,但转念之下,悲从中来:“推想铁蹄蹂躏之下,必有家破人亡之同胞,饮恨吞声而度此除夕者。”^④战时的日常,就是这般无常。

生活于喧嚷无常的共同体之中,最易触发人们对于凝固恒常空间的怀念。于是,作为战时共同体的对应物,桃源世界成为一种普遍向往。丰子恺最初曾有过逃往老家的意向;老家汤溪“地近金华”,丰姓数百家,自成一村。1937年11月下旬的江南,“充满了硫磺气,炸药气,厉气和杀气”,丰子恺便想像汤溪丰村是桃源一样的去处,“起了出尘之念,想率妻子邑人投奔此绝境,不复出焉”,后因从未到过老家,未能成行。不久流亡到桐庐河头上,又一令丰子恺心醉之处:四周处处有竹林掩护,竹林深处,隐藏着精舍。竹林之外,是一片平畴。平畴尽处,是波澜起伏的群山。丰子恺但愿在这里“住到底”,但23天之后,“又被炮火逼走了”。^⑤

现实中没有桃源,丰子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艺术里。“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⑥这是太平日子里曾经的江南区域中的桃源;“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这是完全想象的桃源。^⑦常态的时空,在战时如此值得珍视。

最后关于集中表达共同体意识的“家”。流亡意味着离乡背井,——离家;家是什么?就是《吾家》(同名漫画):大树荫蔽下的茅庐;多少流亡游子梦中的故园。^⑧这就是让丰子恺魂牵梦萦的家:

运河大转弯的地方,分出一条支流,距今运河约二三百步,支流的岸边,有一所染坊店,名曰丰子恺同裕。店里面有一所老屋,名曰惇德堂。惇德堂的里面便是缘缘堂。缘缘堂后面是

① 丰子恺:《清明》,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705~708页。

②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124页。

③ 丰子恺:《宜山遇炸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711页。

④ 丰子恺:《教师日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7卷,第90页。

⑤ 丰子恺:《桐庐负暄》,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5页。

⑥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6卷,第102页。

⑦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6卷,第130页。

⑧ 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漫画全集》第3卷,第309页。

市梢。市梢后面遍地桑麻,中间点缀着小桥,流水,大树,长亭。^①

家就这样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物化景观密不可分。不仅如此,丰子恺在石门湾的家,“窗外有故乡的天空,门外有打着石门湾土白的行人,这些行人差不多个个是认识的。还有各种负贩的叫卖声,这些叫卖声在我统统是稔熟的”。总之,丰子恺说:“这里是我的最自由,最永久的本宅,我的归宿之处。”^②这哪里在忆“家”,分明在叙说其赖以生存的人际交往、历史传统、生活习惯和归宿感,亦即共同体意识。“家”便具有这样的功能,能够整合日常生活中的共同体意识:

向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整合是关于空间中的固定点,即我们由之“开始”(无论是每日的还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并在一定时期向之回归的坚实位置的意识。这一坚实位置是我们称之为“家”的东西。^③

流亡以后,丰子恺每逢听说关于石门湾的消息,晚上就梦见故国平居时的旧事,梦的背景大都是百年老屋。因为“这是我父祖三代以来歌哭生聚的地方……好比是老树的根”。^④亲戚、邻里、朋友常来缘缘堂闲谈平生,“清茶之外,佐以小酌,直至上灯不散。油灯的暗淡和平的光度与……建筑的亲和力,笼罩了座中人的感情”。^⑤这样的家与共同体一样,被赋予了凝固恒常的时空氛围。战争迫使丰子恺离开了家,但“家”具有这样的功能:“可以仅仅通过自身,纯粹靠记忆来滋养自己,尽管遥隔天涯,相距万里,都感到或臆想到近在咫尺,在一起活动。”亲属和邻里之间的亲近和熟悉依然让远在天涯的丰子恺能够感到或臆想到共同体带给人的安宁。

流亡十年之后,1946年秋的一天,丰子恺的脚重新踏上了石门湾的土地。然而,他所踏到的,并非客梦中所惯见的故乡!——“沿路都是草棚、废墟,以及许多不相识的人。他们都用惊奇的眼光对我看……石门湾是游击区,房屋十分之八九变成焦土,住民大半流离死亡”。物非人非,共同体的要素和特征丧失殆尽,于是,次日丰子恺就离开这“销魂的地方”,到杭州去另觅“新巢”了。^⑥

太平年代模糊的共同体意识,就这样在战争状态中和战争造成的距离中清晰起来。这一过程开始于传统共同体的动摇。本来,中国“版图广大而山川险阻。故各地方言歧异,风俗乖殊,向来各地隔阂,乡土观念相当地深……多数的人,为了经济的限制,职业的牵累,还是足不出省,一口土白。大有鸡鸣犬吠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之风”。数百千年扎下的根基,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和心理的樊篱,阻隔着人们的交往。生活在各自共同体之中,既不了解他者,也不清楚自身。“但是不久,敌人又用一种方法来代替撤去这界限……其方法便是轰炸……城市乡村一切不设防区域,他们都投下几个炸弹,杀死几个妇孺,使一生足不出间的土人也亲眼看见了敌人的暴行,使器量褊狭性情冷酷的人,对他方逃来的难民也深表同情”。^⑦如此产生的意识属于另一种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是一种想象共同体,并不为日常生活所占有,但由此而萌生的民族—人文观念对人类的意义却非常深远:“我们的爱会无限地推广。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

①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2页。

② 丰子恺:《家》,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521页。

③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258页。

④ 丰子恺:《辞缘缘堂》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2页。

⑤ 丰子恺:《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58页。

⑥ 丰子恺:《胜利还乡记》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96~198页。

⑦ 丰子恺:《“七七”三周年随感》,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43页。

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之生物。”^①

应该说,作为思想精英,丰子恺对共同体归依的自觉意识,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对人类个体的终极关怀和人格理想的追问,但毫无疑问,作为日常生活者,他与普通民众一道归依于特定共同体,并共享共同体意识,而这正是我们更为关注的日常意义。

余 论

社会史所讨论的许多面貌新异的论题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我们不但需要回应来自传统史学的质疑,而且,有些论题本身也确实少有理性的关照,日常生活的意义便是其中的论题之一。对此,社会史学者当然不能自以为是。

实事求是地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日常意义的问题已经进入包括胡塞尔、列斐伏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赫勒和许茨等在内的许多哲学大家的视野,他们在自身的日常生活理论体系中,多少不同地涉及了日常意义。但这些涉及无论是概念的使用,还是意义的界定,大都是在非常抽象的思维框架和话语体系中进行的;日常的主题采取了非日常的姿态。毫无疑问,这些理论是我们不应该怠慢的,但作为历史学者,如何立足社会史本位,借鉴其它学科理论,思考日常生活的意义,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一些重视日常生活主题的本土人文学者的思想资源,散落在各种样式的表达之中,需要我们仔细捕捉和梳理,以贡献于社会史的理论建树。以丰子恺于抗日时期的流亡经历为背景,考察其对于日常意义的思考,除了彰显日常意义本身,还愿意提供一种观察类似问题的角度。

(作者朱小田,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丰子恺:《全人类是他的家族》,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681页。